

## 邊區舉業與社會資源積累—— 以南宋鎮江為例的討論

黃寬重\*

宋代是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完備並對後代影響深遠的關鍵時期，學界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更引發是否造成社會流動的激烈討論。不過，到目前為止，學界仍側重從朝廷的角度，探討政策執行如何影響資源的分配；未見從地方社會的角度，探討不同地區的社會，對中央政策的因應及影響。本文藉由鎮江士人劉宰在所撰述鄉里人物傳記中，記錄當地士人、家族追求舉業功名的歷程，觀察當地社會仕途發展的樣態，並與明州地區的舉業發展，略作比較，以檢視區域環境的不同，影響士人家族乃至地方社會資源積累與發展的差異。

關鍵詞：鎮江、明州、人物傳記、邊區舉業、社會資源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 一、前言

中國歷史上大規模透過考試選用人才，宋代是關鍵時期。宋代科舉制度的建立與推動，既改變宋代政治文化與社會結構，更對爾後的中國社會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是學界的共識，研究成果極為豐碩；尤聚焦於制度、政策的建立與運作和文化的影響。其中，對於宋廷標舉公正、公平、公開的價值，曾引發學界廣泛的討論，更形成對社會流動與政治開放與否的激烈交鋒。

不過，到目前為止，學界對宋代科舉制度與政策的執行，及因應環境變化所做的調整及成效的討論，仍側重於朝廷政策如何影響資源分配，對不同地方社會承受、因應方式及其影響，仍未觸及。為填補此一認知的缺漏，本人擬由南宋中期鄉居士人劉宰(1165-1239)所著《漫塘集》，撰寫鄉里人物傳記中，從地方社會的角度，記錄鎮江士人家追求舉業功名的歷程，觀察被視為邊防重鎮及交通樞紐的鎮江社會，在仕途發展上的對應樣態，並試與四明地區的舉業發展略作比較，觀察地域環境的不均衡，對士人、家族乃至地方社會資源積累與發展所造成的差異。

## 二、宋代科舉政策與區域發展

宋代科舉取士是與朝廷提倡文治、以優惠條件獎勵士人投身舉業，建立考試與任官制度，結合社會環境、經濟發達、印刷術發展、教育普及等諸多因素，共同締造了超乎唐及明清拔取人才的盛況。據學者統計，兩宋錄取的進士，北宋約有六萬一千多人、南宋約五萬一千人，合計約十一萬人，其中正奏名進士北宋約三萬六千人、南宋近二萬三

千二百人，共計六萬多人。唐代各類進士合計近九千人、五代一千一百二十五人、明代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二人、清代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一人，可見宋代進士總數超越前後朝代甚多。<sup>1</sup>充分顯現宋代科舉取士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宋朝標舉公正、公平、公開的政策，拔擢人才，讓平民百姓得以透過舉業成為官員，改變中國社會，激發學界對考試制度影響中國社會流動議題的深刻討論。柯睿格教授(Edward A. Kracke)以南宋二榜進士題名錄，分析中舉三代的身分，以平民比例偏高，指出宋代是中國社會流動的朝代。爾後，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和韓明士(Robert Hymes)師徒，從家族的視角與資料，提出宋代並非開放性的社會。與此同時的賈志揚(John W. Chaffee)和李弘祺二位教授，透過深刻的觀察與分析，提出修正與折衷意見，這些研究視角都具代表性。<sup>2</sup>

賈志揚和李弘祺二位教授，討論宋代科舉考試制度與政策，對宋代社會流動是否為開放性社會，提出二個有意義的觀察。其一是宋廷透過考試，錄取有志於功名的士人為進士並任官，吸引眾多士人為改變個人命運與家族的社會地位，戮力舉業，進士的身分受到舉世的重視。但他們也指出宋廷晉用人才的途徑極為廣泛，除蔭補、軍功、捐官之外，即使循正常考試任官者，仍包括別頭試、瑣廳試、宗室應舉，特奏名、武舉、制舉、詞科、類省試，乃至太學等諸多途徑拔擢人才，且比例均高。<sup>3</sup>其二，是宋廷透過三個層級、逐級淘汰的方式，拔取

<sup>1</sup> 張希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 宋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十六章，頁 777-780。

<sup>2</sup>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sup>3</sup> 參見荒木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69)；張希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 宋代卷》；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

菁英士人。鄉試採用區域固定分配名額，稱為「解額」，省試則是透過淘汰機制，錄取學藝秀異者為進士，殿試一般並不黜落考生；宋廷重視區域發展的差異，時常調整解額。進士考試是平民百姓入仕的主要管道，吸引眾多有志功名的士人競逐，參與的士人急驟增加。特別在南宋，由於經濟發展迅速，不僅致力舉業者遽增，也因區域差異擴大，呈現區域失衡的現象，宋廷為強化邊區州郡的向心力，雖也採取措施，調整解額，期縮減區域發展的不均衡，但公平性及開放性，仍一再遭到質疑，北宋歐陽脩(1007-1072)與司馬光(1019-1086)就對考試導致南北失衡展開爭論。到南宋，朝臣對朝廷政策造成區域人才失衡的現象，尤多論辯。<sup>4</sup>

宋代解額政策涉及區域資源分配與發展的議題，學界有深刻的討論，並以具體的數據，呈現區域落差。他們利用《宋會要》、地方志及文集資料，從不同角度討論解額制度、實施的過程及評價。<sup>5</sup> 裴淑姬與近藤一成更引錄日本京都栗棘庵所藏南宋《輿地圖》附載的解額表，以南宋晚期重要府州解額的數字為例，討論宋廷因應區域差異及時空轉變，對解額的調整。在這個基礎上，結合賈志揚將南宋境內解額配置，分為邊緣、沿海及江南三大區域，進行比較，讓我們對南宋區域差異影響解額分配，有更清楚且全面的認識。<sup>6</sup>

---

聯經出版，1994)。

<sup>4</sup> 參見賈志揚，《宋代科舉》，第六章，〈登科者的地域分佈〉，頁181-186。

<sup>5</sup> 裴淑姬，〈論宋代科舉額的實施與地區分配〉，《浙江學報》2000：3(杭州，2000)，頁121-127；穆朝慶，〈宋代科舉解額分配制度初探〉，《黃河科技大學學報》8：1(鄭州，2008)，頁42-46；近藤一成，〈宋代科舉社會的形成——以明州慶元府為例〉，《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廈門，2005)，頁15-24。參見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sup>6</sup> 賈志揚，《宋代科舉》，第六章，〈登科者的地域分佈〉，頁179-230。

上述研究觀點，顯然較側重朝廷的視角。宋廷既以公開嚴謹的考試制度，拔擢進士，中舉者仕途也較順遂，是謀求改變個人命運及家庭社會地位的社會大眾希望之所寄，故無不全力以赴；地方社會與州縣長官，也以轄內士人中舉，為鄉里文教有成的盛事。中舉既是個人、家族乃至地方社會的榮耀，因此本文從個人、家族與地方社會的角度，檢視其發展過程，並且比較不同地區的發展樣態，相信更有助於掌握地理、社會、經濟資源的差異對舉業的影響，能夠更多元的認識宋代社會。

從地方視角去挖掘科舉功名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史料的多寡是重要關鍵。在宋代少數富庶繁榮的地區如明州、福州、泉州、溫州等地及名門大族、高官碩儒，留存的資料較豐富，容易進行較深刻的討論。偏遠的邊陲地區、一般家族與平民，留下的史料相對缺乏，很難深入探討。由於學界長期聚焦於中樞朝政、名門大儒及社會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而疏於對弱勢地區、社會乃至平民百姓的研究，導致對中國歷史發展認識失衡，及無法掌握區域發展差異的偏失現象。為扭轉此偏失，本文試圖以南宋的鎮江為研究個案，並與四明略作對照，提供若干不成熟的觀點，請同道指教。

### 三、煙硝邊城：戰略與轉運要地的鎮江

鎮江位於長江南岸，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一向是北方人民往南方移動的中繼站；當中原動亂或出現南北對峙政權時，更是南方政權的邊陲重鎮。而自隋代開鑿從鎮江至杭州八百餘里江南運河後，促進江南地區的生產與經濟的發展，使其成為支撐唐宋國計的重要力量，鎮江與臨江的揚州、真州並為中國南北交通貿易轉輸的重要城市。

南宋政權建立後，與金隔淮水對峙，淮南變成宋抗禦金蒙的邊區。

宋廷基於戰略考量，將位居長江南岸的鎮江與建康，建構為策應淮南防衛的基地。鎮江更由於地理形勢與水陸便捷，躍昇為與建康同為護衛南宋北門的戰略重鎮。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二國所締結的紹興和議，約定雙方不得在沿邊地區駐紮軍隊。宋既為遵守和約，加上淮水淺，金兵容易渡越，為強化防備，宋廷規劃江淮流域成兩道防禦線：淮河南岸為「極邊」、長江南岸為「近邊」。作為守護國境的藩籬。宋廷基於戰略防衛，捨棄江北近敵的揚州與真州，選擇水域寬闊、水量豐沛的長江南岸，設置都統制，領重兵駐守，視需要調派軍隊到淮南州縣，分區戍守，並結合四個負責統籌財務調度、軍需米糧及裝備補給的總領所，承擔防衛政權的重責大任。宋廷在鎮江置都統司及淮東總領所，駐守的正規軍，乾道時期約有六萬八千人，嘉定時期約七萬七千人，嘉熙時期則有七萬九千人。<sup>7</sup> 這些正規軍，即為防衛兩淮東路，拱衛國都所在的杭州(即臨安)。這樣的戰略部署，正是劉子健教授所稱的「前衛」。<sup>8</sup>

宋高宗定都杭州，奠安富庶的江南。由於金兵的威脅，淮南地區一直是宋金的主戰場及防衛的最前線。重兵駐防的鎮江，位於寧鎮山脈之中，三面環山，防禦條件優越，加上長江與江南運河的水道，既能遏敵又便利與京城及四方聯繫，無疑是戰略部署的最佳選擇。

國都南遷及淮水成為宋金國界，讓原先匯通南北的大運河，受到阻斷。在長江與江南運河交會的鎮江，由於水運的便利，反成為承擔中樞與境內各地，特別是淮東沿邊正規軍駐紮地區軍備米糧的轉運樞

<sup>7</sup> 長井千秋，〈淮東總領所の財政運営〉，《待兼山論叢》22(豐中，1988)，頁26-27、雷家聖，《聚斂謀國——南宋總領所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90。

<sup>8</sup> 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收入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頁21-40。

紐。除了鎮江府大軍歲用米六十萬石，每年轉輸臨安的米糧也超過三百萬石。<sup>9</sup>這是江南運河史上漕運量最大的時期。

此外，由江南赴長江上、下游任職調動的南宋官員、軍人，也多經鎮江赴任。陸游(1125-1210)記入蜀歷程的〈入蜀記〉及周必大(1126-1204)的〈乾道庚寅奏事錄〉都記錄他們途經鎮江的旅程。<sup>10</sup>更重要的是，宋金雙方常態性的使者往來及歲幣的致送，也是由國境循江南運河經鎮江、平江等地赴臨安。這方面曾出使的樓鑰(1137-1213)在《北行日錄》及范成大(1126-1193)的《攬轡錄》，有詳細的記載。<sup>11</sup>

受惠於長江與江南運河便捷的水道，大量的米糧、茶鹽與民生經濟物資，乃至金銀器、絲織品等精緻手工業產品，同樣匯集於鎮江，再轉輸南宋境內，兼到宋金邊境的榷場進行貿易，乃至海外貿易。鎮江既是長江流域上商業鼎盛的重要城市，也是宋廷徵集稅源的絕佳場域，遂設置常平倉及榷貨務、江口務、都商稅務等眾多稅務機構，稅務額龐大。<sup>12</sup>稅務所在的江口鎮、漕渠上的淶水橋，是當時商業與茶

<sup>9</sup> 李心傳編纂，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點校，2013），卷一百八十四，「紹興三十年正月癸卯」條，頁3553。江蘇省交通廳航道局、江蘇省航道協會編，《京杭運河志（蘇南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頁5。

<sup>10</sup> 陸游，《渭南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二十，〈常州奔牛開記〉，頁11上-12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一百七十，〈乾道庚寅奏事錄〉，頁1上-33下。

<sup>11</sup> 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宋四明樓氏家刻本為底本點校），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北行日錄〉上、下，頁2082-2125。范成大著；方健整理，《攬轡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參見梁庚堯，〈從南北到東西：宋代真州轉運地位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52（臺北，2013），頁105。

<sup>12</sup> 俞佳奇，〈鎮江運河文化的歷史考察〉，《鎮江高等學報》31：4（鎮江，

文化勃興的場所，<sup>13</sup> 嘉定年間即有六千居民，府城人口近六萬，商業活動蓬勃。<sup>14</sup>

此外，江南運河貫穿鎮江境內三縣，路途長約一百三十餘里，是通達臨安的主水道。為調節水量、便利航運，宋廷在運河沿線設置不少轉輸儲存、停泊的閘、堰，這些地方匯集眾多作坊、造船材料及蔬果販製行業，進一步使沿岸的丹徒、呂城、大港、練壁等市鎮相繼崛起，相互聯絡，形成帶狀商業城市。<sup>15</sup>

南宋的鎮江隨著軍事與經濟地位的提升，且與富裕的江南社會密切聯結，似與江南社會共臻繁盛。但在繁榮的表象下，鎮江社會其實潛藏許多不安定的因素，最居關鍵的是其臨近戰火頻繁的淮南的地理位置。

鎮江地處長江南岸，與兩淮邊地，僅隔江相望，憑藉長江天險及地勢，形成所謂「浙淮北之衝、固浙右之圍」護衛政權的北門。<sup>16</sup> 然而，由於淮東地區既是宋與金蒙兵端時啟的主要戰場，也是山東、淮海地區民間地方武力，肇發亂事的淵藪，直接對政權構成威脅。臨近淮邊的鎮江雖非防衛最前線，實常處於臨戰的煙硝之中，一旦淮南爆發戰爭，鎮江人往往擔心對身家性命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因此，對宋金關係與周遭環境變動的感受與對鄉土的認知，較遠離邊境的宋人更

---

2018)，頁 7。

<sup>13</sup> 劉建國，《古城三部曲：鎮江城市考古》（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頁 199-205。

<sup>14</sup> （元）俞希魯著；楊積慶等校點，《至順鎮江志》（南京：江蘇出版社，1999，據一九二三年陳慶年墨印本、冒廣生朱印本為底本點校），卷三，〈戶口〉，頁 86。

<sup>15</sup> 俞佳奇，〈鎮江運河文化的歷史考察〉，頁 7。

<sup>16</sup> 劉宰，《漫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八，〈倪尚書思〉，頁 9 下-11 上。



為敏銳。

此外，鎮江受惠於江南運河，得與都城及國境各地便捷往來，商業蓬勃發展。但江南運河是結合各地水源及人力開鑿而成，除了便利人、貨往來、轉輸貿易外，更是供應前線軍需米糧裝備的戰備水道。維持水道暢通更是首要任務。平時動員的民力與物資徵集，以維護運河的相關設施及疏濬工程，即為鎮江百姓常規性賦役徵差之外的額外負擔。在戰情緊急時，為充裕軍需，總領所透過府、縣緊急徵集稅賦米糧，更為地方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劉宰在嘉定十七年(1224)致新任金潭知縣葉峴(1312-1386)的書啟中，痛陳當地百姓受官府催逼經總制錢等徵集之苦：「……編民死徙幾半，而急征累歲逋負之租；綱運交發已足，而責償到倉折閱之數。吏胥之迫逮略盡，田里之濟卹未聞」<sup>17</sup>特別是山東忠義軍李全(?-1231)的勢力在淮海坐大，鎮江百姓既感受戰禍臨頭的威脅，又要承擔官府催逼的雙重壓力。劉宰在紹定三年(1230)給魏了翁的信中說：「李全豎子猶得恐喝於淮南，大率淮浙間人如燕巢幕上。況鄉邑去江最近，憂端實多，帥守極力誅求，民生更有可念者。」<sup>18</sup>都深刻揭示鎮江社會在戰時承受的壓力與遭遇。<sup>19</sup>

因此，從現實環境而言，南宋立國形勢，讓位居長江南岸及江南運河交會的鎮江，因水運之便成為南宋國境及與內外交通聯繫的樞紐，且依長江天險及地理優勢，成為防禦南宋北門的重鎮，軍事與經濟地位躍昇，成為商業活絡、社會繁榮的江南重鎮，被視為繁華富盛之地。但對鎮江居民而言，卻不時感受到北境敵犯的威脅，及承擔諸多額外賦役的負擔。臨邊的特殊環境，讓鎮江百姓長期處於煙硝味甚重的不安環境中，與遠離戰區的閩浙民眾，得以長期在穩定環境下平順成長

<sup>17</sup> 劉宰，《漫塘集》，卷十五，〈回葉知縣峴到任〉，頁19下-20下。

<sup>18</sup> 劉宰，《漫塘集》，卷十，〈通鶴山魏侍郎了翁〉，頁16上-16下。

<sup>19</sup> 諸多事例參見黃寬重，〈護國北門：南宋時代鎮江地位的躍昇〉，待刊稿。

與生活，有極大差異。這種對鄉土環境與時代變動的感受與反應，從鎮江百姓群力克服困難，祈求發展機會，得到見證，卻由於看不見煙硝味瀰漫，社會長期處於潛藏不安定環境中，社會資源累積不易。讓鎮江人與上述閩浙富盛地區在舉業及政治權力競逐上，顯得力有未逮。

## 四、功名路迢迢：劉宰筆下鎮江家族的發展群像

### （一）《漫塘集》所記鎮江人物傳記

鎮江在南宋建都臨安，確立背海立國的戰略規劃後，憑著長江天險及運河交通便利的優勢，驟然由區域商業大城，躍升為具全國影響性的轉輸中心與經濟重鎮；也帶給地方社會巨大的轉變。關於鎮江地位的提升及各項制度的建置與運作，嘉定及至順兩部《鎮江志》有清晰的記載。唯關於鎮江人物及社會風土的記載，則失之簡略或有缺漏，以致難以對鎮江社會的發展有較深的認識。

幸好，鎮江鄉賢劉宰撰述的《漫塘集》中，留存不少南宋中晚期的鎮江資料，有助瞭解鎮江社會的發展。劉宰為鎮江金壇人，劉蒙慶的兒子。劉氏原為滄州景城人，五代避居潤州丹陽縣。其祖父劉祀奠居金壇後，全力培養二位兒子嗣慶、蒙慶投身科舉；歷經三代努力，二十六歲的劉宰於光宗紹熙元年(1190)考上進士，開啟劉氏起家之途。

劉宰因得同年好友及岳父梁季秘之助，雖久任州縣幕職，仕途尚稱平順。開禧北伐失敗後，因政局丕變又逢岳父病逝，劉宰遂以殘疾為由，於嘉定元年(1205)辭官鄉居，時年四十五。

劉宰鄉居後，仍關切政局發展，尤關注淮邊戰事對鎮江社會的影響。他憑藉豐富的人脈，向朝中乃至路、府各級官員陳述鄉里困境，為鄉里發聲。同時，凝聚鄉親，合力推動各項公益建設與救濟活動。

其中，發動三次大規模賑饑，最獲朝野推崇。理宗繼位與親政期間，宋廷二次徵召他入京任官，均堅辭不就。嘉熙三年(1238)逝世，享年七十四歲，宋廷頒賜諡號：「文清」，以表彰其善蹟與風範，其事蹟亦載入《宋史》中，是低階官員鮮有的殊榮。他的著作，經整理彙集成現存三十六卷的《漫塘集》。

劉宰的一生見證南宋中晚期內外政局與鎮江社會的變動。他成長與辭官後超過五十五年，都在鎮江活動。任官期間，除短暫在紹興外，建康、泰興、真州等地，都與鎮江相鄰。因此在《漫塘集》保留大量關於鎮江社會珍貴資料，特別是書信與人物傳記，更是了解劉宰一生行誼與人際關係，及觀察鎮江社會實況，最重要的資源。

《漫塘集》收錄劉宰從嘉泰三年(1203)到嘉熙二年(1239)三十七年間所撰寫的共九十篇九十三位親友墓誌銘、行狀等人物傳記。鎮江以外親友有二十九人，鎮江親友(包含元配與繼室)六十四人，超過所撰墓誌的三分之二。這些鄉里人物傳記，結合他受鎮江知府史彌堅之託，提供鎮江府志人物傳記基礎所編撰的《京口耆舊傳》，都是他建立鄉里人際網絡，掌握地方社會資訊的重要資料，是探索集結群力、組織地方社會，推動賑濟、慈善事業與公益活動的基礎，對於認識南宋鎮江社會結構、生活樣態尤為重要。

劉宰所寫六十四位鄉里親友中，有十三位女性，其餘五十一人中，事蹟可稽的有四十七人。本節擬透過梳理這些親友的傳記資料，將他們的仕歷與身分，初步區分成曾任通判以上的中級官員共九位，州縣幕職等十二位低階官員，以及二十四位平民三類，分別就家族情況、致力舉業仕宦的過程，加以觀察，期對南宋鎮江基層社會，有較全面的認識。十三位女性中身分清楚的有三位是中級官員的夫人，四位是低階官員的夫人，另五位是平民之妻；為便於討論，分別納入其夫所屬的類別。

## (二)中級官員的出身及仕歷

與劉宰並世的鎮江人物中，張鎬、趙時侃與王遂三人曾任侍從及路級高官，但其傳記資料未見於《漫塘集》。所見的九位中層官員包括金壇人王萬樞、趙時佐、趙若珪叔姪、湯宋彥及丹徒人楊樗年、楊恕父子、丹揚人鍾將之、鍾穎父子及紀極。另有王萬樞妻蔡氏、趙時侃妻湯氏及趙必愿妻湯氏三位女性合計十二人。王、趙、湯三家與劉宰的關係最為密切。王萬樞曾為劉宰的長官，其子王遂是鎮江人中聲譽最著的名宦，與劉宰理念相近且為親家；劉宰鄉居期間，尤賴他與當代名儒真德秀、魏了翁聯絡、傳遞訊息。因此劉宰記王萬樞及其繼室蔡氏事蹟甚詳。

王萬樞是北宋名宦王韶的後裔。王韶家族原居江州德安，子王霖遭林靈素譖死，孫彥融上書訴冤，召對命官；任淮南轉運判官時移居金壇。萬樞是彥融次子，以蔭任官，先後任平江府崑山縣尉，知滁州來安縣、通判建康府，知興國軍，均有善政，開禧元年(1205)改知吉州，途中病卒，享年六十三歲。妻范氏淳熙五年(1178)去世前生二子，繼室蔡氏生王遂，於嘉定十六年(1223)逝世，享年七十歲。因劉宰與王遂關係密切、互動頻繁，對在王萬樞死後十九年，蔡氏照顧族人及致力子弟舉業的重要事務，尤為詳實。誌文長達二千八百字。

劉宰與好友趙時侃父子的關係也相當密切，若珪曾於嘉定十七年(1224)，捐良田協助賑濟，貢獻良多，相關記述也很豐富。但《漫塘集》只見趙時侃妻子湯氏與庶弟趙時佐、長子趙若珪等三人的傳記。趙氏是趙廷美後裔，趙時侃的曾祖父趙公稱中進士，曾知鎮江府，與

虞允文共抗金海陵王南犯，終贈正奉大夫。<sup>20</sup> 祖父彥恂，亦進士出身，曾知徽州。<sup>21</sup> 父亮夫，蔭補入官，知秀州、潮諸州。長子趙時侃字和仲，慶元二年(1199)進士，曾知滁州、臨安府，後官至工部侍郎，約死於嘉定十六年(1223)。妻湯氏生二子，若珪、若琚。趙時佐是亮夫庶妻所生，慶元三年(1197)以蔭入仕，任和州含山尉等職，於寧國府通判任上辭歸，紹定六年(1233)逝世，享年五十三歲。若珪為時侃長子，以父蔭任官，紹定二年(1229)改知吉安縣，未赴任而卒，享年四十三歲。若珪母湯氏則是金壇名宦湯鵬舉孫、湯國彥之女。

丹徒楊樗年父子是鎮江新興的望族。樗年是南宋外戚錢忱的女婿，曾三次應舉不利，以蔭補任官。爾後，靠其能力晉升至知真州及福建市舶司，其子楊恕也曾三次參加鄉試不利，同樣以蔭補官，後歷任知潮州、大宗正寺丞，提舉淮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鍾氏父子入仕有別於上述三家。鍾將之的先世不顯，他於紹興十八年(1148)中進士後，長年在淮邊任官，由幕職逐步晉升到通判，其弟宜之也在他教導下中舉。將之妻子李氏早逝，子鍾穎自幼在外祖父家長大，先以蔭補官，仍致力舉業，於慶元二年(1196)中舉，鍾穎也久歷淮邊，嘉定十二年通判濠州時，力阻金兵，解淮西之圍，因功改通判隆興府。

紀極是丹陽望族，先世不明，曾鄉舉入太學，仍以蔭任官，雖在基層任職甚久，但不在淮邊，改廣德軍通判，未上任而卒。另一名女性是寧宗名相趙汝愚之孫趙必愿之妻湯氏，他是金壇名賢湯鵬舉孫，

<sup>20</sup> (宋)史彌堅修，盧憲纂，《嘉定鎮江志》，收錄於《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包氏刻本影印)，卷三，〈攻守形勢〉，頁11下-12上。

<sup>21</sup> (宋)談鑰，《嘉泰吳興志》(臺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據民國三年(1914)南林劉氏嘉業堂刊吳興先哲遺書本影印)，卷八，頁8。

孝宗名臣湯邦彥之女。

從劉宰中級官員親友入仕途徑及仕途歷程的記述，有兩個現象值得說明。其一，除鍾將之和鍾穎父子出身進士外，其餘諸人均由蔭補入仕，顯示進士出身並非仕途發展的常見途徑。同時這些人的先世或本人有四人見於《京口耆舊傳》（王萬樞——王厚、湯宋彥——湯鵬舉、楊樗年、鍾將之），含親屬四人（趙時佐、趙若珪、楊恕、鍾穎），僅紀極未見。鄉友中與劉宰交往密切，但未寫行狀墓誌的中級官員則有趙時侃、張鎬（張綱後人）二人，張綱亦見《京口耆舊傳》。由此看來，上述諸人除紀極外，均為鎮江名族，相較於其他家族，出身確具優勢，但他們的官職多及身而止，顯示這些中層官員家族的後續發展有其侷限。此外，這些官僚，雖轉任各地，但不像四明地區有眾多累世富盛的大族，彼此互為奧援，形成向中樞朝政發展的群體，也與在地綿密聯結，長期在地方發揮影響力。<sup>22</sup>

其二，除趙若珪與湯宋彥外，其他諸人都曾在歷練的過程中，任職邊境地區，如王萬樞（守來安、全椒）、趙時佐（和州金山縣、江陵府石首縣）、鍾將之（滁州、和州）、鍾穎（通州、泰州、濠州）、楊樗年（真州、揚州）、楊恕（潮州、淮南東路節度使司、盱眙軍）、紀極（南劍州、溧水縣）。不過，相較於鍾將之與鍾穎父子久任邊地，以蔭入仕諸人的邊境經歷則多屬職務歷練的一環。

劉宰描述這些官員成功之道，旨在彰顯墓主的能力及對家、國不同程度的貢獻。如王萬樞減免興國軍民眾淮衣之徵、趙時佐在婺州募勇士、趙若珪嘉定十七年推動並捐獻救災、湯宋彥分家產及任子恩給家人，鍾將之在和州平息軍屯田與民田的糾葛，及提升淮邊舉業競爭

<sup>22</sup> 黃寬重，〈四明家族群像〉、〈四明風騷——宋元時代四明士族的衰替〉，收入黃寬重，《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頁 67-200, 139-169。

力，鍾穎在濠州抗金有功、楊樗年楊恕父子建寶經堂教育鄉里子弟及救助貧困士人、紀極阻止調派崑山海船到長江禦侮等勞績；至於善待家人、教育子弟、平息糾紛等家族事務，與其他士人官僚夫人墓誌所述相類似，但他們的後代，除王遂外，在仕途上均後繼乏力。

### (三)低階官員的選擇

《漫塘集》中保留劉宰書寫任低階官員的鄉里友人事蹟，共有十二人。這些人的出身相當多元，其中有七人是中進士後任官，三人是武舉出身任武職官，二人是特恩補官，加上四位女性共十六人，其中有七位(張汝永、汝升、孫沂、王元實、范克信、張鎮妻韋氏)是劉宰的姻親。進士同年兩位(陳景周、趙崇悉)、鄉試、同學同年四位(張汝永、汝升、張鎮及陳景周)，諸葛埴是劉蒙慶的學生。這些墓主的生命歷程頗多曲折，但涉及的政務相對單純，事蹟較諸中級官員簡要。至於敘述內容的多寡，則與墓主的仕歷及與劉宰關係的親疏有關。

劉宰筆下十二位長期在基層官職浮沉的同鄉好友中，進士出身者有四人考上時已超過五十歲(陳景周五十七歲、張汝永五十四歲、張汝升五十五歲、衛翼五十四歲、孫沂四十二歲、李紳四十歲、趙崇悉二十七歲)，有七位曾在南宋邊防地區，包括宋金邊境以及鄰近溪洞羈縻邊區任職，如李紳(楚州山陽)、范如山(真州督酒務、瀘溪、江陵公安)、范克信(許浦水軍、廣西經略司)、翟起宗(黃州麻城)、王元實(安豐軍霍丘、武岡軍綏寧、江陵、鎮江府都統司)、張汝永(和州含山)、諸葛埴(安豐軍安豐縣、江陵糧料院)。其中武職入仕的范如山、范克信和王元實，更是長期任職於邊區。翟起宗與諸葛埴二位晚年才以特奏名入仕，一生僅擔任對宋人而言是極邊的黃州麻城縣主簿(翟起宗)與安豐軍安豐縣主簿(諸葛埴)之職。未曾在邊區任職的有衛翼、孫沂、陳景周和張汝升、張汝永兄弟五人。此外，入仕僅一任而死的

有陳景周(溧陽縣)、翟起宗(麻城)、諸葛埴(安豐縣)及衛翼(池州貴池縣主簿)，他們入仕時已屆齡五十四歲，仍盡心負責，政績受肯定，卻浮沉基層，坐困下僚。劉宰的同年趙崇悉，具宗室的身分，雖二十七歲就中舉，殆因不良於行，未見任職紀錄。

劉宰的親友在邊區任官比例偏高，可能與他們的出身及居住環境有關。這些人中例如張汝永、汝玘的張氏雖是京口望族，但族人不曾在中樞任職，況且中舉時，年歲已高，或僅為特奏名出身，在員多闕少的南宋，這樣的出身在職場競爭上實居劣勢。既然僅任在州縣基層官，仕途發展有限，選擇離家近，反而有許多便利。淮南與鎮江僅一江之隔，地理相鄰，民情相近，任職淮邊，並無違和、貶抑的感受，且便利與家族的聯絡維繫，可以就近照顧父母。因此有不少人和劉宰一樣，除了短暫到浙東任職外，反而選擇鄰近邊境的江淮地區，像張汝永晚年選擇溧陽、張汝玘選擇句容，所考慮的即是與家族聯繫方便。

對於大多數江浙士人而言，淮南是邊地，到淮邊任職是不得已的選擇。擔心邊境爆發衝突或戰事危及生命之外，該地的氣候、地理條件與家鄉差異也大，適應不易，如餘姚人孫應時於淳熙十三年(1186)為仕進、奉祿，不得已才到海陵縣任縣丞。當時海陵已六十年無戰事，但他眼中仍是人煙稀少荒蕪的不毛之地；至歲末，更備感寒冷寂寞。<sup>23</sup> 淮邊的各項條件與資源均無法與閩浙地區相比，若非情勢所迫，絕少人考慮到邊地任職。諸多現實因素，讓鎮江人與閩浙士人到淮邊任職的心情和接受度，有極大的落差。

<sup>23</sup> 孫應時，《燭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十六，〈海陵歲暮〉，頁20上。黃寬重，《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頁51-52。



南宋的鎮江人民與其他地區一樣，均致力舉業，追求科舉功名，締造獲取功名的機會。有能力的家族，更設法創建提升子弟舉業的環境。不過，與富庶且教育文化發達的閩浙沿海及江南地區相較，鎮江地區培養出來的進士不僅人數少，中舉時的年齡也偏高，在仕途競爭的起點即呈弱勢；加上政治奧援不足，難以在政壇形成集體性的力量，更遑論參與中樞朝政。不過，相較於長期飽受戰火威脅的淮南邊境百姓，鎮江進士名額多，經濟發達，政經條件仍具優勢。從地理環境而言淮河、長江不僅連結，形成南宋國防的屏障線，也讓兩個地區人民有唇齒相依的一體感。因此劉宰筆下多數在安豐、山陽等地任職的鄉友，和紹興人孫應時到海陵任職時，所顯露孤寂疏離的心情相比，有明顯的差異。從鎮江士人選擇到溧陽、句容乃至淮邊地區任低階官員，可以看到近邊的京口士人面對仕途發展，採取順應現實的心態。

至於劉宰筆下的四位低階官員的妻子都非世家出身，所記事蹟以主持家務相夫教子為主，內容相對簡略，但在女無外事的傳統記述之外，因著本人或丈夫的個性、家境、仕途發展的差異，也呈現若干特點，如記張鎮的夫人韋氏，突顯具有影響世教人心的事蹟，竇從謙的夫人是影響丈夫處世的賢內助；二位武職夫人則顯現豁達大度，以相夫教子，承擔家務為重的形象。

#### (四)平民的形象與社會樣態

《漫塘集》收錄劉宰對鄉里親友的墓誌中，未仕的士人或庶民共二十四人、女性六人，合計三十人。姻親關係的有六人，其中孫大成

是劉宰妹妹的公公。<sup>24</sup> 徐處士不知名諱，其子徐藻是劉宰長子汝琦的岳父。<sup>25</sup> 蔡希孟是劉宰堂兄恭靖先生的女婿。<sup>26</sup> 江模的弟弟江遂良則是劉宰姪孫劉宗朝的岳父。<sup>27</sup> 高與之的女兒嫁劉宰次子汝遇。<sup>28</sup> 雷震的兒子雷應龍娶劉宰的四從姪女。<sup>29</sup> 劉宰伯父及父親的學生或友人三人(施俊卿、陳武齡、湯頤年)，一般鄉友有十四人，其中費進士、信庵老人、諸葛貢元(鑑)、王進士(士朋)、蔡希孟、江進士(江模)、王光逢及周氏等人的生平事蹟簡略。

劉宰為鄉里不仕友人所寫的墓誌傳記，不僅在他所寫的傳記中比例很高，在宋人文集也極為少見，是觀察宋代基層社會很珍貴的史料。劉宰辭官後，鎮江是他主要活動場域，三十年間關心的事，多聚焦於鄉里，和絕大多數以追求功名為志，來往於中央與各地方任官、就學的士人，僅短暫鄉居，有明顯的差異。他鄉居期間推動地方事務，來往的鄉親多是平民百姓或不仕士人，彼此互動密切，情誼甚篤，為這些親友撰寫墓誌的機會自然多，是《漫塘集》的重要特色。

劉宰寫不仕鄉里友人的內容繁簡差異甚大，篇幅長的超過一千七百字，短則僅三百字，內容的繁簡、詳略與墓主個人經歷、及與劉宰關係的親疏相關；受人之託且認識不深的鄉人，多記請託人所敘述的事蹟；輩分懸殊，互動不多的人，即使是姻親，其內容也相對簡略。

不過，對一些事蹟較少的墓主，劉宰則透過與墓主關係密切的人物，來襯托墓主的風範。如在湯頤年的行狀中，側重描述湯家的背景

<sup>24</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三，〈孫府君行述〉，頁 26 上-29 下。

<sup>25</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一，〈徐處士墓誌銘〉，頁 22 上-24 上。

<sup>26</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一，〈蔡希孟墓誌銘〉，頁 21 上-21 下。

<sup>27</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二，〈江進士墓誌銘〉，頁 7 上-7 下。

<sup>28</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二，〈高與之墓誌銘〉，頁 3 下-5 上。

<sup>29</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二，〈雷翁墓碣〉，頁 29 上-30 上。

及與劉宰家人的互動，兼及他二位兄長的事蹟。對陳嘉言的行誼，也強調兄弟情誼及他如何經由與陳嘉言子姪締交，進而認識嘉言，來鋪陳墓主的角色。

在二十四位不仕鄉人與五位夫人中，除諸葛鎡、巫大方、茅拱、雷震和醫僧宗可五人未見接受教育的記載外，其餘十九人則曾受教育，志在舉業者(孫大成、徐處士、高與之、江模、蔡希孟、湯頤年、陳嘉言、陳武齡、艾謙、施俊卿、徐蒙、陸從龍、陸坦之、丁游、王光逢、劉通伯、王士朋、費元之及王洪)，其中棄學轉而營生的有孫大成、陳武齡、徐處士(藻之父)、高與之、施世英等五人，而終生執意舉業則有湯頤年、徐蒙、丁游、劉通伯、陸從龍、陸坦之、艾謙、蔡希孟、王光逢等九人。這些人中，家境富裕的有十一人，包括孫大成、徐處士(徐藻父)、高與之、雷震、江模、湯頤年、陳武齡、施俊卿、茅拱、王光逢、陳嘉言，而孫大成、徐處士、雷震、高與之、江模則與劉宰有姻親關係。至於他們營生致富的行業，除艾謙、孫大成、徐蒙與王士朋，有行醫的事蹟外，墓志中多略而不談，其營生的情況並不清楚。

這些墓主，不論是終生致力舉業或經營產業致富後，仍以教育子弟，爭取功名為職志，包括徐處士、雷震、孫大成、陳武齡、陳嘉言、艾謙、陸從龍、陸坦之、茅拱、巫大方、王光逢等十二人，其中徐藻、孫沂、陳景周、艾慶長、陸坦之五人，都是在父親栽培下考上進士，是家族起家的人物。

劉宰所記京口平民鄉友，除僧宗可等極少數人之外，可以看到鎮江和絕大多數宋代家族一樣，不論家境貧富，都以培養子弟讀書業舉，爭取功名作為努力的目標，高中進士自然成為鎮江士人家族追求的典範，但在南宋科舉競爭甚為激烈，中舉門檻極高，鎮江人考上進士的人數不多，因此，在墓誌中常見鄉人把中鄉舉及入太學，當成邁向功名的重要階梯，是家族的榮光，對大多數難以考中進士的鄉人而言，

就讀府州縣學生，中鄉舉或入太學，具有士人身分，即擁有部分稅役如身丁錢、差役科配等減免的優惠及法律的特殊待遇。<sup>30</sup>

減免稅役固然為富裕家庭帶來名利雙收，錦上添花的實質利益。對絕大多數貧困家庭而言，更具翻轉社會地位的意義。劉宰在雷震墓誌銘中指出，雷震父親死後，家產被繼母所奪，家境艱苦，戶籍淪落，窮困潦倒。他為扭轉以財富評論社會地位的觀念，努力振興家業之外，更扶持二子專心舉業。等到次子雷選通過鄉舉為待補太學生後，特呈請官府重新釐定戶籍，改變鄉里評價。這一記述，見證鄉試或成為太學生，對絕大多數鎮江平民而言，固然爭得邁向取舉業競爭的資格，也是具有翻轉社會地位的標誌。特別是到臨安就讀太學，能開拓眼界與人際關係，是地方士人另一項重要社會資本。可見鎮江人為圓舉業的榮光，不論路途多麼坎坷難行，甚至無法遂其願，仍孜孜不倦，一代代的沿著前一節所述追求舉業的道路前進。

劉宰對不仕鄉友生平的描述，除了彰顯藉教育爭取功名的價值之外，有兩個重點。一是這些鄉人有很高的比例都有賑飢、濟貧、扶持鄉黨宗親的善舉。包括孫大成、徐處士、高與之、湯頤年、陳武齡、施俊卿、陳嘉言、丁游、徐蒙、茅拱、衛翼、巫大方等十一人。他們義舉善行的規模，雖然大小有別，都是促進家族與地方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像高天賜打通從句容到京口的道路，以實際行動來實踐他們造福鄉梓的社會情懷，與劉宰標舉儒家人飢己飢的理念相切合。這樣的論述在《漫塘集》以不同文體，經常出現，也顯示他個人理念及其標舉的社會價值。

此外，在墓誌中也可看到劉宰藉墓主言行，突顯儒家的主體理念，

<sup>30</sup>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192-204。李弘祺，〈宋代的舉人〉，收錄於《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頁297-314。

例子有二。他寫孫大成以經營產業致富，平常則喜歡靜坐，「好道術，宅心事外」，<sup>31</sup> 加上好聚方書、丹藥，顯然是道家之流。劉宰在大成的墓誌中，曾指斥牟利致富的商賈及以禮為械、以家為累的道家，卻認為行善及興家與臨死不惑的言行，是他與道家有別的。<sup>32</sup>

另外，鎮江宗教活動甚盛，社會風氣受佛道的影響尤深，人死後多選擇行佛道之禮儀。但劉宰特別指出陳武齡早年雖篤信佛教，晚年反對以佛教儀式葬其子。<sup>33</sup> 鄉先生艾謙死後，其家屬遵循儒禮葬他，不受世俗影響。<sup>34</sup> 將這二個例子與劉宰其他墓誌，特別是婦女部分結合觀察，可以看到當時佛道及民間信仰，深入基層社會，劉宰對這種社會風氣深感憂心，宣示儒家禮儀，頗有扭轉世俗風氣的意圖。

至於劉宰撰述五位鄉里平民之妻：艾謙夫人李氏，孫大成妻子張氏、徐汝士妻子李氏、翟起宗母親周氏、及袁清卿妻子邵氏，在女無外事的傳統下，強調他們如何相夫教子，維繫或成就家庭的發展，特別著力詮釋他們培植子弟、致力舉業，是締造家族起家的重要推手，以及夫死嫁為繼室的邵氏如何成全夫志，善待非己出諸子，都是體現傳統女性的地位及更深的生命價值。

## 五、與明州家族發展的對照觀察

選擇以明州家族與鎮江作比較，與個人對研究議題與資料熟悉度有關。鎮江與明州都是趙宋立國江南後，因國防、經濟而崛起的城市。

<sup>31</sup> 劉宰，《漫塘集》，卷二十九，〈故張氏孺人墓誌銘〉，頁6下。

<sup>32</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三，〈孫府君行述〉，頁28下-29下。

<sup>33</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一，〈西園陳居士墓誌銘〉，頁5下-6下。

<sup>34</sup> 劉宰，《漫塘集》，卷三十，〈故澹軒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誌銘〉，頁5下-6下。

觀察這二個地區家族，為爭取仕進，從學習舉業與任官的發展經歷，有助於認識區域社會發展實況與差異，也可調整學界長期以來將南宋的江南社會視為一體的印象。

學界對明州、鎮江二個地區的研究成果，有顯著的差異。關於南宋的明州(四明或慶元府)，由於地位突出、經濟、文化繁盛、加以文獻資料豐富，研究成果極為豐碩，其中斯波義信教授《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宋代商業史研究》，與陸敏珍教授《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的專著，是了解宋代，特別是南宋明州發展的重要著作。

<sup>35</sup> 同樣的，由於四明在南宋科第成就顯著，並產生甚多宰執侍從官員及累世名門望族，研究著作很多，包括筆者的《宋代的家族與社會》一書曾探討的袁氏、汪氏、高氏與樓氏著名家族，戴仁柱(Richard Davis)教授《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討論四明史氏家族；此外尚有很多研究論著，茲不贅述，<sup>36</sup> 相對的，對中低階士人官員及一般平民家族的研究不多。近二十年來，由於低階官員及一般平民的墓誌相繼刊布，研究略有增加，林明《從四明墓誌看宋代平民家族》即為一例。<sup>37</sup>

至於鎮江的史料，除二部鎮江方志外，甚為稀少。學界對鎮江歷

<sup>35</sup> 斯波義信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斯波義信，〈宋代明州の都市化と地域開發〉，《待兼山論叢》3(豐原，1969)，頁127-148；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sup>36</sup> 戴仁柱(Richard Davis)著；劉廣豐、惠冬譯，《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出版社，2006。

<sup>37</sup> 最近林明的《從四明墓誌看宋代平民家族》開啟明州平民研究的議題。林明，《從四明墓誌看宋代平民家族》，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史地理或家族社會發展的研究論述，除劉建國《古城三部曲》及張立主編《鎮江交通史》外，相當有限；對鎮江人物及家族研究更少。<sup>38</sup>

四明與鎮江二地懸殊的傳世史料與研究成果，正反映兩地在南宋時期的發展迥然有異。本文擬藉由粗略比較，希望可以引發同道的討論，進而開展新的研究議題。

為便於對照、觀察，先對明州的地理形勢與環境，略作介紹。明州位於浙江東北部，三面環山，北部瀕海，西南為四山等丘陵，北部與中部則屬寧紹平原的一部分，地勢平坦，有三江貫流其中，河流密布。<sup>39</sup>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在此置明州，是設郡之始。到五代，明州有較實質的開發。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確立明州統轄六縣，加上先前建置市舶司，整個行政區劃完成。南宋，基於戰略需要，宋廷於紹興三年(1133)在明州設置沿海制置司；寧宗慶元元年(1196)升格為慶元府。<sup>40</sup>

大運河到杭州之後，經浙東運河可抵明州，讓明州從水路經杭州轉輸各地，及循海路與浙江、福建、廣東，乃至東向日韓、南向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等地，進行海上貿易，明州成為宋代浙江東北部貿易蓬勃的城市。紹興八年(1138)宋廷基於海道防備的需要，於定都杭州後，在明州配備水軍二千人。明州既為京畿之地，更因便捷的交通、航海技術的發達，海外貿易勃興，發展為聯結長江與海內外各類貨物集散中心，致造船、紡織、陶瓷、礦物、藥材等物產或手工藝產品交易活絡；與鎮江並為南宋重要的商業與軍事重鎮。但各種產業迅速發展，各

<sup>38</sup> 劉建國，《古城三部曲：鎮江城市考古》；張立主編，《鎮江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sup>39</sup> 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頁115。

<sup>40</sup> 斯波義信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頁478。

類市鎮遍布，人口激增，卻也出現農業生產停滯的不平衡發展。<sup>41</sup>

為強化農業生產，明州自唐中期起，積極改善水利灌溉、開發新的可耕地。當地百姓相繼增築海塘，阻擋海潮的侵襲，修建堰碶、陂塘，攔蓄河水，疏濬湖泊及整治平原上地河川網等各項水利工程，致稻作、茶農業有長足發展。在水利工程發展過程中，地方民間力量協助官府組織、管理、執行工程，貢獻顯著，特別自紹興八年(1138)起，由於國防、財政負荷加重，宋廷在水利資金乃至組織管理等興修水利的職能，直接移交給地方力量。地方社會既承接官方的權力，為維護各灌溉區的利益，建立協商機制，形成互助合作的共同體。<sup>42</sup>

明州百姓，在協力推動水利建設的基礎上，更攜手教育鄉里子弟，開展舉業。在范仲淹(989-1052)推動慶曆興學期間，四明地區，即由樓郁和楊適、杜醇、王致、王說五人，透過學校，打開舉業之途；其中，進士出身的鄉賢樓郁主持州縣學，教導豐稷、舒亶、袁穀、汪鏐、俞允、羅適等鄉里子弟，透過舉業，躍入仕途，帶動舉業仕進的風潮。此後，明州人在中舉入仕之途大有斬獲，據戴仁柱教授統計北宋進士共有一百二十四人，是宋朝擴展地方學校教育成功的例證；到南宋中舉者更多達七百四十一人，約為北宋的六倍，且為臨安的一倍半，居江浙之冠。<sup>43</sup>更出現累世舉業有成的家族，袁氏家族前後有十六人中舉，樓氏第八、九二代中舉者二十二人，在南宋政壇具舉足輕重的史氏

<sup>41</sup> 斯波義信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後篇 寧波的狀況〉，頁 475-499。

<sup>42</sup> 陸敏珍，〈水利建設與區域社會整合〉，《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頁 113-175；Sukhee Lee, *Negotiated Power: The State, Elit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Twelfth- to Fou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97-125.

<sup>43</sup> 戴仁柱(Richard Davis)著，劉廣豐、惠冬譯，《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頁 33。



則有二十八位進士。<sup>44</sup>由於入仕任官的人數激增，不僅產生累世仕宦的名門望族，也讓明州成為南宋最具影響力的地區。

南宋明州士人家族，在致力仕途發展的同時，更藉同學、同道乃至婚姻關係，強化聯結。像史浩與汪大猷既是同學又是同年的進士，而袁燮、沈煥、舒璘、楊簡均為陸九淵的弟子，是闡揚陸學的代表人物。這些鄉里子弟及陸學門人，由於共學與共事的機緣，甚至締結婚姻，彼此的聯繫更為緊密，樓氏與汪氏二家的婚姻即為顯例；鄞縣的汪氏，從汪元吉起，即與樓郁相交，後來汪思溫之女嫁樓鑰之父樓璩，而其子大猷娶樓璩之妹，大猷之女嫁樓鑰之弟樓鏞；累代婚姻促進彼此在仕途上互相提攜，並在鄉里公益與文化活動中，發揮磁吸效應。

在同學、同年及婚姻的基礎上，更由於朝中高位者的援引、薦舉，凝聚成政壇上優勢群體，在政治社會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這方面顯然以久居相位的史浩、史彌遠父子，是關鍵的角色。史浩執政後，不僅指導袁燮仕途發展，更在淳熙八年(1181)自己辭相時，向孝宗推薦袁燮、楊簡等四明士人，其後也出現汪大猷推薦錢象祖、史彌大、沈銖等人、樓鑰推薦楊簡、高似孫、樓昉等現象。在多個家族共同致力舉業，爭取入仕，進而互相薦舉，互為奧援的情況下，四明世族共出現五位丞相、十位參知政事；其中史氏家族即出現三任丞相，二百位各級官員。<sup>45</sup>是南宋政壇上最具優勢的政治集團，因此在寧宗朝有「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的諺語。<sup>46</sup>

明州世族在創造仕進的同時，更致力蒐藏典籍文物，成為家族傳統，引領時尚，建立領袖群倫的身分與地位。在宋廷推動文治，揭示

<sup>44</sup>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 67-200。

<sup>45</sup> 戴仁柱(Richard Davis)著，劉廣豐、惠冬譯，《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頁 36。

<sup>46</sup> 張端義，《貴耳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下，頁 77。

文化立國的政策，及皇室崇尚文藝的引領下，各類書畫文物的蒐藏及鑑識研究，成為時代風尚。到南宋，高宗與孝宗二帝深具文藝素養，並標示藝文為承繼政權的正統性。在帝王及政策的推動下，帶動了士人群體，重視書畫文物蒐藏與評賞的風氣。當時，凡經歷一二代經營舉業有成的官宦之家，多不惜財力，蒐藏文物，並讓子弟在致力舉業的過程，兼培養其文化素養，作為提升家族地位的新標幟。或致力專業學術思想的發展，為家族傳統。樓氏家族到樓鑰一代，致力累積文物書畫，以重建家族傳承、恢復家族榮光，更以文物鑑賞開展人際關係的活動，袁燮、楊簡、沈煥家族在宣揚陸學角色，高氏家族在經學、史學等方面，都在舉業之外，獲取顯著的成就。<sup>47</sup>

這些家族，除各自建立文藝學術專業地位外，彼此更透過個人乃至家族間的合作，推動具特色的地區文化活動。史浩在淳熙八年(1181)告老返鄉之後，曾延致沈煥居竹溪，楊簡講學於碧沚，加上袁燮、舒璘和呂祖儉等人一齊帶動講學辯論之風，讓四明成為南宋教育學術活動中心之一。史浩與汪大猷則先後推動以怡情游賞、賦詩唱和為主的詩社，如五老會、八老會，乃至真率之集等。他們更與地方官員興復以尊老序齒，具有團結士人及建立鄉里集體意識的鄉飲酒禮。這些文化活動能行之長遠，形成地區文化傳統，汪伯庠、汪大猷、何炳、陳卓等重要家族的推動，及鄉人的積極參與，固是重要因素，而三代為相的史氏家族，更在凝聚眾力，型塑文化特色上扮演的關鍵角色。

四明士族，除了個別參與修建州縣學校、造橋鋪路，乃至救濟慈善活動等地方公益活動外，進一步組織超越家族，具有集體意識、地

<sup>47</sup> 參見黃寬重《藝文中的政治》中相關研究議題，特別是頁 109-300 及頁 343-352 關於南宋由朝廷推動文藝蒐藏、活動風潮及形塑士人家族歷史傳承及游於藝的研究。黃寬重，《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頁 67-101, 175-200。

域色彩，標示經濟互助的「鄉曲義莊」。鄉曲義莊的構想由史浩先在紹興府推行，好友沈煥為砥礪四明士人建立廉能政治的理念，建議在家鄉實行。史浩在汪大猷、沈煥、樓鑰、袁標、高文善及富人邊氏等人支持下，共同籌劃、勸募、制訂規章及執行的工作。這種以民間為主、官府為輔的運作模式，是四明士人及其家族走出各自的藩籬，經由合作而創下的重要舉措。<sup>48</sup>

北宋的明州，在農業與海外貿易，奠定社會經濟繁榮的基礎，也受惠於宋廷文治及教育政策，讓士人家族在安定的環境下致力舉業，崛起政壇。到南宋，遠離戰場，社會穩定發展及貿易勃興，躍居為京畿之地。更在朝廷擴大舉才的政策下，由舉業入仕的士人家族驟增，已居江浙之冠。這些士人家族在崛起的過程中，經由教育、婚姻，乃至鄉里情誼等方式，相互合作，形成集體力量。這種力量不僅在政壇上互相扶持，即便辭官返鄉，仍一齊攜手，共同關懷鄉里。他們從個別人物或家族出發，不論對慈善救濟、鄉里建設。或詩社、鄉飲酒禮。乃至鄉曲義莊、鄉賢祠等地域性的公共事務，都因群力合作，獲致豐碩的成果。這樣的成績，大約在慶元黨禁之前，已充分展現。四明名門望族，不論在政治與學術，乃至文化思想的表現，都達於顛峰，是四明士族群體表現的最佳時期，也讓四明成為全國最富特色的地方。

透過比較觀察，顯示鎮江與明州雖然都是南宋國防與商業重鎮，卻由於地處近邊與京畿，造成社會穩定性的差異，影響社會資源累積，以致二地士人家族在舉業功名和社會發展上，有明顯的差距。

不過，鎮江社會與鄰近金國的兩淮、荊湖乃至西南邊區，則明顯

<sup>48</sup> 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213-237；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頁 124-131。

居於優勢，甚至也優於江浙富庶地區的衢州、常州、嘉興、江陰等地。<sup>49</sup>顯見鎮江僅在舉業競爭上較少數富盛府州遜色，而非發展失敗。這些比較顯示，只有透過更細緻的研究觀察，我們才能評估區域之間的差異與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 六、結論：區域舉業發展差異與社會資源積累

本文由地方社會的角度，結合個人與學界探討科舉與家族發展的成果，嘗試以南宋鎮江與四明地區為例，觀察在舉業發展上，二地社會的差異，並試圖提出下列五項看法。

一、南宋在北宋的基礎上，為適應環境的變遷，反映區域的差異，對解額有所調整。目前的研究將宋代科舉社會劃分成邊境、江南與沿海三大區塊。若仔細檢視各地區科舉發展情況，此種區分仍有可商榷之處。鎮江、建康等鄰近淮南的長江南岸諸地與其他江南地區相比，在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士人致力舉業仕進的努力，看來並無差別。但細究分析鎮江士人參與科舉的結果，鎮江士人舉業競爭力雖非弱者，但會發現大區域內，各州差異之處仍多。若能對三大區域的內部，進行更細緻的探討，相信將能發掘更多元價值的研究議題，探索彼此發展的軌跡與差距所在。

二、比較鎮江與四明二地的舉業活動，可以發現平民與低階官員的士人家族，皆積極教育子弟，致力舉業。差異較明顯的是經由科舉獲致中高階的官員。四明家族，不僅成功的比例高，且出現累世及位居宰執侍從的家族，這些官員更因彼此扶持，在政治上形成龐大的優勢群體。相對的，鎮江中舉者分布零散，即便躋身中樞，頂多也只出

<sup>49</sup> 黃寬重，〈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收入黃寬重，《宋史論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頁86。

現趙時侃、王遂等少數幾人，且輿援不足，不具競爭優勢。至於中階官僚多任職地方，出身蔭補的比例高，且僅一兩代即止。鎮江出身的低階官僚甚多，特奏名出身者佔比高，他們中舉時已屆垂暮之年，只能選擇被沿海、富庶江南地區的士人視為偏遠，赴任意願不高的淮邊或臨邊地區任官。這種發展差異，是鎮江社會政治資源累積不足所致。

三、鎮江與四明士人家族爭取仕進與經營鄉里的成效，差異亦大。在南宋由於政治環境變動頻繁，且官多闕少，以致士人的發展從北宋致力全國性的變革，退回耕耘鄉里。參與舉業不順利者，往往藉知識在地方社會教書謀生。鄉居官員則藉同學、同鄉之誼，相互連結，關懷鄉里、凝聚群力，共同耕耘家鄉，並形塑鄉里意識，這種情況不僅在鎮江與四明，甚至瀰漫於南宋轄境。這種社會力雖因地而有規模大小之別，卻是南宋士人深耕中國社會最具特色之處。只是從二個地區士人在人力組織、關懷層面及運作上，也充分顯現社會與人力資源的累積及理念的差異。四明地區的鄉曲義莊、詩社、鄉賢祠，多由高官名儒出面組織，建立制度及運作機制，其中鄉曲義莊超越北宋以來的家族義莊，標舉知識分子的清廉價值，運作長達數十年。上述鄉里組織，不僅能提升士人們身分價值，且有助於形塑四明社會的文化特色。相對的鎮江士人多著眼於解決地方社會的現實問題，推動社倉、賑饑等救助活動。這樣的工作，主要是由人脈廣闊，深具鄉里情懷，且長期鄉居的劉宰出面，先以個人之力，結合鄉親，進而組織推動，終能結集眾力，進行大規模的賑災。一旦缺乏像劉宰這樣的人，只能回到原有鄉里小規模合作的義役及賑濟活動，正因如此，南宋鄉里活動的規模與時效，與明清地域社會的持續性長期發展並不相同。在南宋有聲望、具理念且能結集群力的官員，是推動鄉里建設的主力。不過，絕大多數的仕宦士人，固因待闕、丁憂乃至致仕而

回歸鄉里，卻仍關切中樞朝廷的變動，心繫仕途發展；在外地任官的鄉人，雖也關心鄉里事務，卻只能從旁協助，無法具體結合鄉親，形成社會力。另外眾多通過鄉試的士人，由於資望既不足統合各方，且以爭取舉業仕進為重，同樣只能推動小規模的互助活動。這種差異同樣是社會累積造成的差異。

四、從鎮江與四明社會的發展，可以看到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發達程度，足以影響資源的累積。宋代的鎮江雖因江河的便捷而蓬勃發展，又因駐守重兵，創造商業活絡、社會繁榮的景象。然而，臨近兩淮邊地，面臨來自北方的戰爭及亂事的威脅，加上為備戰動員，運輸軍需、疏濬河道及臨時的動員與徵調，致社會穩定性不足。長期在不安的氛圍下，士人家族雖戮力舉業，很難累積資源，僅能培育少數優異子弟，以競逐功名作為家族發展主軸。但在四明地區，眾多累世相承的世家大族，在長期經營舉業有成、擴展人脈發展之後，更著力創造厚實的學術文化資產，開啟子弟文藝教養，並以文會友，擴大社會資源，建立社會聲望。如四明樓氏有長期蒐藏文物書畫，子孫受到薰陶，鑑賞與研究文物的能力受到當代士人的認同與尊崇，他們藉文物與當代名儒相交，形成游於藝的群體。此外從史浩起，以其庭園為基地，結合學界、藝文、方外之士，厚植文化環境，經營具有四明特色的社會文化活動。且締建出影響後代更為深遠的文化力。反之在鎮江社會所見，從劉宰本人、其家族乃至上述的鎮江士人，僅見全心追求舉業，重視教育，及推動社會互助，鮮少以文會友的詩社活動的記載，更不見家族蒐藏書畫文物及游於藝的藝文活動。這種現象，充分顯示在安定的環境中，一般家族，經歷幾代努力，在追求功名有成，財力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有餘力蒐藏文物，並培育子弟在舉業外的藝文能力，進而以文化素養，累積社交資源。家族文化薰陶及社會文化素養，是不同區域社會長期上的差異所致。

五、爭取舉業是社會發展的一項特徵，中舉者不僅成就個人功名，也是家族建立社會聲望的重要指標。宋人視進士為起家，是家族發展的起點。在宋代人物墓誌中，屢見不鮮。業師陶晉生教授對此有精闢的論述。<sup>50</sup>在南宋富盛地區對家族發展，像四明士人在標舉進士起家之餘，不少家族更積極累積資源，以追求累世仕宦及位列宰執名儒為目標。鎮江地區雖然重視教育，投身舉業，但考中進士的人，兩宋一百七十七人，南宋僅近一百人，每次科舉錄取者只有二、三人。和南宋絕大多數的地區一樣，鎮江士人雖視進士為起家的標誌，卻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極高門檻。在鎮江人物傳記中，雖然揭示受教追求舉業為家族要務，卻往往將通過鄉試的舉人與太學生，視為個人與家族教育發展的成就之一，表述於墓誌或傳記中。顯示在競爭激烈環境中，族人具備爭取進士資格的舉人與太學生，已是家族教育有成的指標，具有起家的意義。究其實，緣於舉人、太學生不僅具備參與省試的資格，中舉有望；這樣身分，也享有在賦役乃至刑法上的特權，受到官府與鄉里的尊重。因此，宋代的舉人雖然不及明清的舉人，擁有法定的功名身分，仍是鄉里社會中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在鎮江，這些人可以群力在鄉里發揮影響力。劉宰在鎮江推動各項社會義舉中，都有這些在鄉里社會有所貢獻，卻無功名士人的身影。這種起家認定標準的差異，也與地區社會發展程度有密切關係。

另一方面，從四明與鎮江地區科舉對家族發展，可以觀察到不同地區社會流動的差異。四明地區由於世家大族中舉者多，且累世高官，擁有豐厚的教育、經濟資源，又藉情誼、婚姻創造政治社會

<sup>50</sup>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優勢。故而當地社會流動較為遲緩。反之，鎮江中舉的高官比例少，居官者也僅一兩代即止，在所有家族傾力競爭舉業的情況下，不論平民、低階官員，持續在鎮江社會中上下起落，社會階層流動反較四明來得明顯。此類區域社會的發展不均衡，也是研究社會流動者值得關注的視角。

(本文於 2022 年 4 月 18 日收稿；2022 年 9 月 4 日通過刊登)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匿名審查人、王錦萍教授、童永昌博士與熊慧嵐小姐提供修訂意見，謹致謝忱。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元)俞希魯 著；楊積慶等校點，《至順鎮江志》，南京：江蘇出版社，1999，據一九二三年陳慶年墨印本、冒廣生朱印本為底本點校。
- (宋)史彌堅 修；盧憲纂，《嘉定鎮江志》，收錄於《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據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包氏刻本影印。
- (宋)李心傳編纂；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點校。
- (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范成大著；方健整理，《攬轡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
- (宋)孫應時，《燭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陸游，《渭南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劉宰，《漫塘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宋)樓鑰著；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宋四明樓氏家刻本為底本點校。
- (宋)談鑰，《嘉泰吳興志》，臺北：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據民國三年(1914)南林劉氏嘉業堂刊吳興先哲遺書本影印。

### 二、近人論著

- 江蘇省交通廳航道局、江蘇省航道協會編，《京杭運河志(蘇南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 李弘祺，〈宋代的舉人〉，收錄於《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

- 1988), 頁 297-314。
-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
- 林明,《從四明墓誌看宋代平民家族》,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 近藤一成,〈宋代科舉社會的形成——以明州慶元府為例〉,《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15-24。
- 長井千秋,〈淮東總領所の財政運營〉,《待兼山論叢》22(豐原,1988),頁26-27。
- 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 俞佳奇,〈鎮江運河文化的歷史考察〉,《鎮江高等學報》31:4(鎮江,2018),頁5-9。
- 荒木敏一,《宋代科舉制度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69。
- 張立主編,《鎮江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 張希清,《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張端義,《貴耳集》,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 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收錄於《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213-237。
- 梁庚堯,〈從南北到東西:宋代真州轉運地位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52(臺北,2013),頁53-143。
-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 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斯波義信著;方健、何忠禮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
- 斯波義信,〈宋代明州の都市化と地域開發〉,《待兼山論叢》3(豐原,1969),頁127-148。
- 黃寬重,〈南宋兩浙路社會流動的考察〉,收入黃寬重,《宋史論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頁73-104。
- 黃寬重,〈護國北門:南宋時代鎮江地位的躍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待刊稿。
-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出版社,2006。
- 黃寬重,《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

- 黃寬重，《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 黃寬重，《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 雷家聖，《聚斂謀國——南宋總領所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 裴淑姬，〈論宋代科舉額的實施與地區分配〉，《浙江學報》2000：3(杭州，2000)，頁 121-127。
- 劉子健，〈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收錄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頁 21-40。
- 劉建國，《古城三部曲：鎮江城市考古》，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 穆朝慶，〈宋代科舉解額分配制度初探〉，《黃河科技大學學報》8：1(鄭州，2008)，頁 42-46。
- 戴仁柱(Richard Davis)著，劉廣豐、惠冬譯，《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
- Sukhee Lee, *Negotiated Power: The State, Elit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Twelfth- to Fou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97-125.

## **Examination Degrees and Social Resources in Border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Zhenjia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uan-chung Huang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crucial period in whic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was fully developed and highly influential.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 examination system brought about social mobilit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historians. However, the social impacts caused by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deserve further investigation. Until now, most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entral government, hardly recognizing the responses of local society to the examination policies.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history of Zhenjiang, which was located near the northern border of Southern Song territory and has failed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historians. Mostly relying on the writings Liu Zai, I explore the methods by which the local elite in Zhenjiang pursued examination degrees and official careers. To reveal how regional resources influenced the choices of local elite, this article further compares the history of Zhenjiang with Mingzhou. Being the economic center of the Song, the Mingzhou elite enjoyed abundant academic resources which considerably benefited them in examination competition. Through its analyses,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resources and examination participation.

**Keywords:** Zhenjiang, Mingzhou, biography, examination participation in border areas, community resources